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演錄

陳博生先生講

敵情研究

二十八年三月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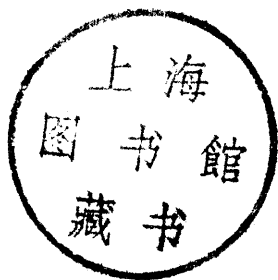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8480B



目 錄

- (一) 日本政治演變的三大時期
- (二) 日本政治制度的三大弱點
- (三) 日本左右兩派的特徵及發展
- (四) 元老重臣與既成政黨的衰落
- (五) 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 (六) 日本戰時經濟的體制
- (七) 日本戰費來源的窮困
- (八) 日本國民負擔力的薄弱
- (九) 通貨膨脹的惡性化
- (十) 農村問題與農民的貧困
- (十一) 日本社會的奇怪現象



1027932

敵情研究 目錄



敵情研究

陳博生

(一)日本政治演變的三大時期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政治的演變，可分三大時期。第一期自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二月二十一日公佈憲法起，至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九月止，二十九年間，可謂爲藩閥官僚及軍人互相授受政權時期。第二期自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九月廿九日政友會原敬內閣成立起，至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大齋藤實內閣瓦解止，約十四年間，是政黨全盛時期。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二十六日齋藤實內閣成立起，至現在止，可謂爲漸進的右派軍人全盛時期。日本內閣制度成立於憲法公佈之前，當時正是維新的初期，所以於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十二月第一次內閣成立時，第一任總理大臣，便是伊藤博文，他的閣員，都是當時參與維新的大人物。那時候，民權論當然很盛，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日本政黨的开始——自由黨已經成立了，自由黨是板垣退助所組織的，即政友會的前身。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改進黨組織成功，大隈重信是一個領袖，可以說是民政黨的前身。但是民衆

的力量，尙未能結成一種勢力，可以與藩閥及軍人對抗，所以在第一期二十九年之中，組閣的人物，只有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縣有朋，西園寺公望，桂太郎，寺內正毅等幾個人。在這時期內，政黨業已萌芽，例如西園寺公望，大隈重信，桂太郎等組閣，雖不無多少政黨的基礎，但政黨是寄生的狀態，並不能取得主動的地位，這是值得注目的。政黨在寄生狀態之下，利用社會的環境，與教育的進步，漸漸培養了獨立主動的勢力，所以在第一期中，已種下政黨政治必然實現的種子。當時政黨的奮鬥，也非常猛烈，強化黨的組織，擴大黨的地盤，收羅社會上的人才，吸收資本家的力量，所以在二十一年以前，即一九一八年，純粹的政黨內閣，首由政友會總裁原敬組織成功了。原敬在任不過三年，被人暗殺了，但因政黨在民衆中，已經有了很鞏固的基礎，而且領袖的人物，都是有聲望有材幹的，所以第一次政黨內閣雖然受了重大的打擊，而依然可以支持下去，這在日本政治鬥爭史上，是很有意義的。自原內閣起，十四年間，完全是政友會與民政黨更番組閣的時期。其中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因爲遭遇了空前的大地震，山本權兵衛（海軍領袖）的混合內閣乘機出現，只維持了四個月，便瓦解了。繼起的是自命爲超然內閣的清浦奎吾（是重臣

之一，現已退隱了）內閣，其實是純粹的官僚內閣，各黨當然反對。當時最有力的三黨——政友會，憲政會（即民政黨的前身），革新俱樂部，爲爭取政黨的地位聯合不信任清浦內閣，議會解散，改選結果，三黨佔絕對大多數，清浦內閣辭職，由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組織三黨聯合內閣，這是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六月間的事。自是以後，直到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總理大臣犬養毅被刺，時勢大變，右派軍人認既成政黨爲國家罪人，非推翻政黨政治不可，時局急轉直下，元老重臣徬徨無措，一方固不敢接受右派軍人的主張，一方亦不敢維持政黨內閣的常軌，乃推薦海軍元老齋藤實組閣，希望可以收拾時局。政黨內閣至此，正像患了急病的兒童，剛剛十四歲，尙未成年，便夭折了。齋藤是一位平穩無疵的老軍人，在海軍部內，雖有資望與勢力，但是少壯軍人對他是不滿意的。稍明內幕的人們，都痛切認識，這種辦法，是不能持久的，更不能收拾難局的。齋藤內閣支持不到兩年，便讓給他後輩岡田啟介組閣了。岡田內閣本是齋藤內閣的延長，齋藤毫無成就而去，岡田在這嚴重局勢之下，更是拱手無爲，從昭和九年（一九三四）七月，維持到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二月，釀成日本歷史上空前大事件的「二二六事變」，廣田弘毅得了

近衛文麿的推薦，負起收拾空前變故的大責任，組織內閣。中間又經過了林銑十郎與近衛文麿兩內閣，才到現在的平沼騏一郎內閣，這是漸進的右派軍人全盛時期。

(二)日本政治制度的三大弱點

我們從明治制定憲法以來，到現在的五十年間，檢討日本政治演變的過程，可以知道他們立憲政治所以未能成功的原因，有三。第一個弱點，日本憲法是由上而下的，所以憲法的規定，對於民權的發展，有很多的限制，例如議會的最大權力，是預算審議權，與不信任內閣權。而日本衆議院的預算審議權是與貴族院相等的，貴族院是官僚的巢窟，貴族院可以牽制衆議院的行動，並且衆議院對於內閣，沒有不信任投票權。假使衆議院彈劾內閣，內閣可以解散衆議院的。日本人民迷信官權非常厲害。從日本選舉史看來，過去二十次總選舉結果，除了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清浦超然內閣以外，沒有一次不是政府黨勝利的。在實行議會政治的初期，政府公然干涉選舉，惹起政潮，是「司空見慣」的醜事。至今賄買，干涉的弊害，仍時有所聞。所以他們雖然經過了五十年的訓練，憲政還是一個虛名，讓成今天這種局面。第二個弱點，日本內閣官制上，規定陸海軍大臣必須由陸海軍

現役大中將充任，這是政黨政治的致命傷，因為現役軍人是不許加入政黨的。當時立法的意思，就是軍人要永遠取得政治的支配權，特別想出這一條規定，來阻止政黨政治的發展。可見明治維新時，建軍元祖山縣有朋的陰謀狡計。在大正初葉，政黨政治家，如犬養毅，尾崎行雄，原敬一流人物，極力設法取消這一條，主張文人也可以充任陸海軍大臣。經過了二十年的努力，於昭和初年，才改爲豫備役的陸海大中將，也可以充任陸海軍大臣。但是到了廣田內閣，又恢復原狀，依然是非現役不可的了。所以無論任何人組織內閣，陸海軍方面必提出條件，來相挾制，以謀貫徹他們的主張。組閣者如不接受他們的條件，就組織不成功。因陸海軍內部的慣例，新任的陸軍大臣候補者，是由陸軍三長官推薦的，所謂三長官卽是陸軍參謀總長，陸軍教育總監，陸軍大臣，他們是三位一體的，代表整個陸軍的意見與態度。新任海軍大臣的候補者，是由海軍軍令部總長與海軍大臣推薦的。陸海軍大臣不是由組閣的總理大臣，可以自由從現役軍人中選任的。有了這層層的束縛，所以陸海軍就取得了內閣的制命權，這是日本軍人支配政治的最大武器。第二個弱點，是陸海軍的帷幄上奏權。日本把陸海軍的編制、指揮、軍政，全劃在普通國務以外，所以內閣

對於陸海軍事項，絲毫沒有過問的權力，除了陸海軍豫算以外，任何事項都不經過閣議。陸海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總長都有直接上奏權，即所謂帷幄上奏權，所以內閣對於陸海軍事項，即有意見，非得陸海軍當局的同意，便不能貫徹，因為陸海軍當局可以單獨上奏，一經裁可，內閣也無法補救了。關於帷幄上奏權，雖限定於有關統帥權事項，但事實上陸海軍當局往往濫用這特權，並且無法糾正，所以帷幄上奏權，在政治上作用甚大，又成爲軍人干涉政治的一大武器。

上述三端，是日本憲政上最大的弱點，演成今日軍人支配政權的局勢。五十年來，政黨政治家所努力爭取的政黨政治，恐怕在最近一二十年內，不但沒有實現的可能性，而且還有向相反的方向急進的趨勢，這是日本政治的悲哀！

(三) 日本左右兩派的特徵及發展

思想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是無待贅言的。日本在明治初期，因為憂時之士目擊幕府專政，天皇成了傀儡，所以尊皇論風行一時，差不多成了不尊皇便不愛國的風氣。到了明治中葉和末葉，由歐美各國畢業歸來的青年漸多，而且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於是民權論

又繼尊皇論而起，風靡一世，尤其在我國革命成功以後，蘇聯革命成功，歐戰結束的前後，民主思想，更爲青年所心醉。我們如果翻閱當時日本所出版的刊物，就可以發見每期都有這一類的討論，各大學中研究社會科學的青年，比任何學科都多。大正七年（一九一八）政黨內閣所以能成功，也是受這時代潮流的影響。不但在政治上表現了若干較近民主政治的措施（如普通選舉等），即在社會運動上，也樹立了相當基礎。左傾團體的存在，雖然不能獲得政府的許可，而藉各種學會或其他名義作掩護的左派團體，非常之多。左派在思想上，下了很普遍很有效的種子，所以，現在法西斯思想雖極猖獗，他們受了重重的壓迫，依然有很堅強的努力，這是最可注目的。左派活動最盛時期，是從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到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六年間，時間雖不長，根基很深入，至今衆議院中尙有一位碩果僅存的左派議員（加藤勘十），可見他們的潛勢力，是不可輕視的。現在在勞動運動中，屬於左派系統的，有全國勞農協議會，加入的勞動團體很多，但是他們受官權的壓迫，非常厲害，自中日戰爭發生以後，當然更不能公開活動。當左派最活躍時期，他們的意見，參差不一，陣營內戰線，並未統一。有的主張英美式民主政治，有的主張社會民主主

義，有的主張共產主義，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但從日本政府幾度大規模壓迫之後，有的轉變了，有的屈服了，所以現在所遺留下來的左派秘密團體，大概都是傾向於蘇聯路線的。最近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左傾風潮，轟動一時，也是受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連累，值得注意。因為日本軍權高於一切的時代，左派的公開活動，自然是不為政府所允許的，但他們在社會各方面潛行的反軍閥，反戰爭的活動，是很活潑的。他們活動力量，是隨着民衆生活困難，而繼長增高的。一旦時機成熟，有突然爆發的可能性。

日本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國家，一國之內派別分歧本來不是一件意外事，但日本對抗左派的右派團體，非常奇怪，屬於神祕的佔大多數。這或許是日本民族性迷信神權的結果。當左派全盛時，右派的結合，已經開始了。右派的陣營，亦異常複雜，大別之，可分急進的右派與漸進的右派。急進的右派雖然也有許多派別，但他們有個共通之點，即主張「天皇親政」。他們以為在現行制度之下。天皇的大權旁落了，所有一切國務，皆由內閣負責，而產生內閣的實權，又在幾個元老重臣的掌中，天皇不過虛有其名而已。在元老重臣的背後，操縱政權的，又是幾個大財閥，所以要廓清政治，必須推翻資本家與資本制度，

掃蕩元老重臣以及既成政黨，始能建立真正「一君萬民」的政治。他們的主張之中，如「產業奉還論」，「政權奉還論」是最具體的。「產業奉還論」即將全國所有的私人產業，皆應奉還國家。「政權奉還論」即將政權奉還天皇。他們以爲要貫徹這種信念非採用革命手段不可。所以自昭和二三年（一九二七——二八）起，實行革命手段的第一步，便是採取暗殺行動。昭和五年（一九三〇）當時總理大臣濱口雄幸（民政黨總裁）被刺，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前財政大臣井上準之助，三井公司總經理團琢磨的被害，以及轟動一世的五一五事件，總理大臣犬養毅在官邸遇害，連續而生，一直到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二二六事變發生，叛兵殺害了許多重臣，都是一個系統，一個線索的。他們以爲暗殺可以喚起元老重臣資本家以及既成政黨的反省，但是，依然不能發生很大的效果，所以才潛入軍隊，實現革命的行動。然而二二六事變失敗以後，反右派的議論瀰漫全國，而元老重臣資本家以及既成政黨雖痛切感覺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皆有「改弦易轍」的必要，但對於右派的革命行動，當然也認爲非澈底肅清不可的，所以於事變鎮定之後，政黨內閣雖因此消滅，而「肅軍」亦成爲極嚴重的問題。右派受了這次悲慘的教訓之後，也知道採取革命行

動，是毫無把握的，於是改變方針，由合法途徑，以圖改造政治。所以最近四年來，他們從事民衆運動，企圖組織政黨，爭取政權，現時他們所成立的政治團體，缺乏組織，並且沒有統一的領袖，和民衆的地盤，前途尙屬遼遠。既成政黨之中，東方會與右派甚爲接近，如果將來右派的大聯合組織萬一可以成功，則東方會也許可以成一個中堅的團體。

日本右派團體，雖然多屬於神祕的性質，但他們因爲可以吸收許多壯軍人，故在軍部中，獲得了中堅的勢力，利用這種力量，決定全軍的主張，由陸海軍大臣，以國務大臣的資格，干與國政。急進的右派失敗之後，現時最佔勢力的，便是漸進的右派。這派以爲急進的方法，必然引起各方面的反對，阻礙甚多，不如漸進，較有把握，所以自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以後四年間，他們是依着這種方針，努力貫徹他們的主張。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二）以後的齋藤，岡田，廣田，林四內閣，都是敷衍局面，並沒有切實執行這一派的主張，所以急進派固然不平，漸進派也認爲希望甚少。近衛內閣，在這種環境之下，應運而生。近衛內閣成立僅僅一個月，他們就發動了蘆溝橋事變，促進他們對外侵略對內改革的大計劃。在近衛內閣十九個月任內，他們完成了「戰時體制」的改造，在政治及經濟

方面，實現了許多統制辦法，使日本在事實上，向着法西斯的路線前進。所以急進的右派在形式上，雖然沒有成功，在實質上，他們的主張在相當程度內已經貫徹了。但右派尚未滿意，他們以爲在政治制度方面尚有許多重要問題，未曾改造，沒有達到「庶政一新」的目的。如貴族院制度改革問題，衆議院選舉法修改問題，既成政黨改造問題，是急進的與漸進的右派所共同主張的。近衛內閣任中，雖然設立了兩個調查委員會，但至今尙無具體方案。平沼內閣成立後，對於這些問題，亦無一言提及，所以右派對於現狀，認爲仍未能達到其所期望的程度，非組織強有力內閣不可，這是敵人國內所潛伏的政治危機。右派所以能取得支配政治的力量，軍人佔多數，固爲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官僚厭惡政黨的結果，依附右派軍人，希圖操縱政治，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日本政治上，官僚的勢力，不可輕視，官僚可以左右元老重臣，同時又可以在右派黑幕中活動。當初右派專與資本家爲難，後來資本家也知道這種潮流是不易對抗的，有一部分資本家也投在漸進的右派陣營去，要在內部，糾正他們的主張，所以漸進右派活動的資金，有出自資本家的。這幾年漸進的右派與資本家比較接近，原因在此。

就現在日本政治的趨勢而言，向着右邊走，是毫無疑義的，雖然有元老重臣，既成政黨，一部分資本家，以及社會智識階級的自由主義者的幾種力量，牽制着，不許急速向極右狂奔。但是，這幾種力量，只能在某種程度內，使其慢走，絕不能使其不向右走，更不能使其向後走。當前日本政局，尙是幾種相反的勢力，互相牽制着，漸進的右派力量，比其他力量大，所以一步步向右走。我們的觀察，以爲日本在不久將來，有產生純粹右派的內閣的必然性。在這內閣之下，完成一大部分右派的主張，因此引起國內反右派的反抗，釀成政治上的大門爭。

(四)元老重臣與既成政黨的衰落

我們對於日本政治的動向，最後不能不提及元老重臣與既成政黨。日本所謂元老，在憲法上並無根據，明治末葉，因維新功臣甚多，尤以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松方正義這幾位老臣，都是對於國家有特殊勳勞的，所以遇着國家大事，必徵求他們的意見，然後決定辦法。尤其內閣變動時，對於組閣人選，一定要這幾位推薦的，所以元老變成了內閣的製造者。大正繼位，當然遵循遺規，益加重視元老，以後又加入大隈重信，西園寺

公望兩人。這一般老臣相繼物故，現時只剩西園寺一人了，西園寺是快到九十歲的老翁，自知前途有限，而又感覺當政變發生時，非有元老重臣陳述意見，則一切難題，或不易立決，所以於五一五事件時，特創立新例，推薦組閣人選，不取決於元老一人，由所謂重臣階級人物，共同討論，以最後意見，轉陳日皇。所謂重臣，並無法定資格，大體上限定於內大臣（即掌璽大臣），宮內大臣，樞密院議長，以及曾經累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人物。但急進的右派本來反對元老重臣，累次暗殺的對象，都集中在這一團人物。元老如能早日消滅，當然是他們的願望，現在於元老垂盡的時候，又創設甚麼「重臣會議」替代變相的元老，自然更加反對。同時漸進的右派，既成政黨也不以為然，即自由主義者，根本上也不贊成，國內輿論可謂一致反對。二二六事件以後，西園寺更不敢採取這種重臣會議的方式，所以現在在形式上依然由西園寺一人決定，而事實上，則西園寺於決定之前，暗中徵求內大臣和樞密院議長的意見以作參考。一旦西園寺死後，元老自然消滅，在無形中，繼承元老的人物將來大概屬於湯淺凡平，近衛文麿兩人。現任宮內大臣松平恆雄因為特殊關係，也許可以參加。元老的存在，是日本政治民主化的障礙物，同時又是法西化的制動機。

日本既成政黨，現時比較有力的，只有三黨。第一是民政黨，第二是政友會，第三是社會大眾黨。民政黨與政友會歷史甚久，從明治初葉的改進黨與自由黨演變而來的。當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到昭和七年（一九三二）是兩黨更代組閣的時期，是政黨的黃金時代。當時兩黨的領袖以及幹部，的確都是優秀的人物，如民政黨的加藤高明，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井上準之助等，政友會的原敬，高橋是清，床次竹二郎，犬養毅都是一代的鬥將，所以民衆對於政黨有相當信仰。一般社會對於黨弊，抨擊雖然很厲害，但是政黨所苦心經營的地盤，始終沒有動搖。原敬，濱口雄幸，犬養毅，高橋是清，相繼遇害，加藤高明，床次竹二郎先後物故之後，兩大政黨，就剩下一個軀殼，所以遭遇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二），便無法挽回頹勢了。最近七年間，既成兩大政黨，完全在軍閥官僚支配之下，仰人鼻息，希圖苟存而已。在近衛內閣末期，因為「國民再組織」問題，引起了重大糾紛。所謂「國民再組織」，涵義固多，而改組既成政黨，實為最主要因素。改組既成政黨，換句話說，就是將既成政黨變成法西斯黨，這是兩黨所一致反對的。現時既成政黨雖然微弱無力，而遇到危及他們生存的問題，當然要反抗的，近衛不敢在這重大時機，引起這樣嚴重

糾紛，即形式上舉國一致，也不維持，所以辭職而去。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既成政黨與新興右派勢力，有不能調解的癥結，遲早總要爆發的。從現在政黨的實力看來，似乎一定要失敗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又似乎尚不能即下斷語。關鍵全在兩黨有無決心與勇氣，及黨內團結力的強弱。因為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總選舉的結果，選舉有權者的總數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八人之中，約有九百萬人，是屬於兩大政黨的，約佔日本全人口八分之一，佔選舉有權者總數百分之七十，當然是很有力量的。兩大政黨如能運用這民衆力量來實行鬥爭，勝敗正未可知。可惜既成政黨的鬥志，比以前差得多了，並且缺乏領袖的人物，不能統一全黨的意志，向右派陣營衝鋒，只得觀望時機，苟延壽命。民政黨在町田忠治領導之下，團結力尙形鞏固，但內部仍有問題。政友會從鈴木喜一郎辭退總裁之後，因各派對立，至今尙沿用代行委員長制，替代總裁制，黨內的傾軋，最爲劇烈。既成政黨長此因循，各黨內部必然要發生分化的。

至於社會大眾黨，從前在日本衆議院中，可說是比較向左的唯一的合法政黨，但是他們所信奉的是國家資本主義，並且其中一部分黨員與軍閥早有相當聯絡，所以於昭和十二

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十五日該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時，將以前擁護工農勤勞大眾的生活，及打破資本主義，以解放無階級的黨綱，完全放棄了，而主張「根據日本國體的本義，謀日本國民的進步和發達，改革資本主義，以求產業的計劃化和國民生活的安定」了，從階級意識，而變為國民意識，從反資本主義，而變為擁護資本主義。這可謂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所以最近該黨有與衆議院中最右派的東方會合併，但是尚有相當阻礙，一時不能成功。

總之日本既成政黨有許多內在的弱點。並且任何黨派都有一部分黨員傾向於漸進的右派的，所以無法向右派進攻，同時各黨又互相猜忌，不能樹立一個聯合戰線，為政黨政治奮鬥，這是日本在現階段政局中，最可注目的一個局勢。最後要補充說明的，就是政友會是以地主及金融資本家為基礎的，所以對華政策，注重華北，並且要取得許多利權，作為投機的根據地。民政黨是以商工業者為基礎的，所以對華政策，注重華中及華南，目的只求推銷生產品。這是大體上區別，可以作為我們參考的。

（五）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日本國民經濟是建立在農業與輕工業上面，並且是在自由競爭主義的資本制度下發達起來的，日本是缺乏原料的國家，國防上所需要的鐵，羊毛，棉花，煤油等等，都是依賴外國供給的。所以日本雖然擁有相當的海陸軍，而從經濟上看來，尙不能謂為獨立的國家。日本每年礦物生產的總額，約在五萬萬八千九百萬日元左右，而輸入的總額，約六萬萬三千七百萬日元，合共十二萬萬二千六百萬日元，其中輸出的不過一萬萬三千二百萬日元，所以日本每年所需要的礦物，只有一半是國內生產的，其餘一半，要靠外國供給的。例如鐵的需要量，每年約四百四十五萬二千噸，而他們國內的生產量，只有六十七萬三千噸，不過六分之一。煤油需要量每年約六千六百八十七萬箱，而國內生產量，只有五百三十一萬八千箱，不及十分之一。棉花，羊毛等於沒有。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們痛感國防工業原料的缺乏，於是極力設法實現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建立重工業的基礎。

日本國民經濟上，有一極大的缺陷，即對外貿易繼續入超，已達二十年之久，日本輸出品之中，以棉織物，絲織物，人進絲織物，食料品，人造絲等為最多。輸入品之中，當然以原料為最多，佔輸入總額百分之七十。這樣入超連續的國家，當然要引起一個最嚴重

的問題，便是黃金出口。日本國內每年產金量甚少，據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統計，不過三千八百一十六萬日元，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四千五百五十八萬五千日元，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五千四百六十九萬二千日元（以上包括朝鮮台灣在內），昭和十二年以後，因為戰爭關係，並無數字發表。自從中日開戰以後，日本對外貿易，入超更多。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入超，是六萬萬日元左右。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是四萬萬九千萬日元。所以增加金的產量，是日本所苦心焦慮的，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八月制定「產金法」，極力保護獎勵產金事業，以五年計劃，達到每年能生產二萬萬日元的黃金。據今年他們財政大臣任議會的報告，知道去年金的產量，遠在預定計劃之下，成績甚劣，可是確實的數字，祕不發表。

日本現在究竟尚有若干黃金，這是很重大問題，而至今尚未得確實數字。在開戰以前，日本銀行所存現金準備，共五萬萬二千四百萬日元，是以純金七百五十公絲（即一千公分之〇・七五〇）作一日元計算的。但是當時金的市價，比這法定的價格高兩倍以上，所以於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八月變史評價，以純金二百九十公絲作一日元計算。日本銀

行的金準備五萬萬二千四百萬日元，一變而為十四萬萬一千餘萬日元，其中八萬萬日元仍留日本銀行作現金準備，其餘六萬萬二千餘萬日元，撥作特別資金，充作償付國際債務之用。在過去十幾個月中，日本所用以購買外國軍火軍需原料，以及償付國際債務的現金，除了這一筆六萬萬現金之外，尚有原存外國的現金，約一萬七八千萬日元，新生產的金一萬萬日元左右，收買民間存金約三四千萬日元，及各大公司存在外國的現金，約六七千萬日元，以及公私所有的外國債券股票。去年因為這些現金尚不足用，又從日本銀行所存八萬萬現金準備之中，提出三萬萬日元，作為償付入超的基金。從表面上看來，日本銀行尚有現金五萬萬日元，但暗中是否已經提用，尚不可知。據外國專家推測，恐怕這五萬萬日元的現金，也是有名無實，早已盜用了，所以「金」的問題，是敵人最大的苦惱。

「金」是戰爭的要素之一，世界的戰術大家克勞維茲曾經說過：一戰爭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尤其現代作戰，經濟戰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檢討敵人經濟力，方面很多，而由敵人特殊國情看來，「金」的問題，是一個中心。敵已有的金，已經快用盡了。我們估計，即在敵人現時極端統制輸入及管理外匯的辦法之下，而每年入超，至少不能

在四萬萬日元以下。每年新生產的金，是有限的，至多不能超過兩萬萬日元，今年雖然開始強迫民間交出金器金首飾等，但是日本民間所存的金，是微乎其微。向外國借款，在當前國際環境之下，也是不可能的。他們佔領了許多我們的都市，極力想推銷仇貨，但是他們所取得的，全是日元鈔票或是變相的日元鈔票，不能因此取得外幣，增強外匯，所以這一點是觀察與判斷今後敵人的戰鬥力，最重要的因素，敵人經濟力的脆弱性，可以充分看出來了。

(六)日本戰時的經濟體制

敵人痛感他們經濟的脆弱性，所以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右派軍人力倡從速完成「準戰時體制」，這當然包括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制度在內。歷年政治上的摩擦與鬥爭，皆由此而來。政治上的改革，始終沒有成就，原因何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經濟上的改造，自七七事變以後，才一氣呵成，實現了「戰時經濟體制」，這是時勢所造成的，雖然有一部分人仍認這種體制，尚未澈底，但從敵人經濟史看來，可謂為空前的改革。第一是「資金調整法」。昭和十二年（一九二七）九月公佈的。這是實行經濟統制的第一步，將全國的實業

，分爲三種。金融機關對於各種實業的放款或投資，超過十萬日元以上，必須先得主管大臣的許可。凡與軍需工業有直接關係，或有密切關係的實業，爲甲種；凡與軍需工業有間接關係，或爲國民生活所必需的實業，爲乙種；此外皆爲丙種，如印刷業，保險業，金融業等是。屬於甲種的，當然許可，屬於乙種的，經嚴格審查後，大體也許可，只有丙種，以不許可爲原則。這個立法的意思，是儘量將資本集中，促進軍需工業的發達，同時將擴張或創辦戰時所不必要的實業的資金，集中購買公債。第二是「臨時輸出入措置法」，也是昭和十二年九月公布的。因爲日本是入超的國家，同時又是缺乏黃金的國家，爲謀國際收支平衡計，尤其在戰時，更不能不求外匯的穩定，極力設法減少輸入。根據這個法令，將外國貿易品，分爲三類，甲類是在敵人國防工業上所不可缺少的，在國防工業所需要的程度內，允許輸入。如棉花、羊毛、木料之類是。乙類是與國防工業無關，而且是國民生活上不必要的商品，一律全部禁止入口，約有三百餘種之多。丙類是日本的國產品，因國防關係，禁止出口的。這兩個法令是樹立「戰時經濟體制」的基礎。

後來因爲戰局日益擴大，僅賴這兩種法令，尙不足以適應戰時的需要，必須有更大規

模的物資動員。敵人的物力，財力、人力本來是有限的，尤其財物兩力，更覺缺乏，非實行全國總動員，不能支撐。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九日，由內閣擬定「國家總動員法」草案提交議會審議。經貴衆兩院通過後，於同年五月三日公布，自五月五日實行。國家總動員法內容，共五十條，從人力，物力，財力三方面，規定在戰時如何配合國家作戰的需要，發動力量，在平時應如何培養這三種力量，作戰時的準備。政府可以根據這動員法的規定，制定特種法令，實現其中某一項動員的具體辦法。所以國家總動員法雖然公布了，但是每一項的條文，都有了實施的詳細辦法，才算是實行了。當制定國家總動員法時，資本家很反對，因為與他們本身利益有害，尤其該法第十一條中，限制各公司分紅，及強迫貸款的規定，資本家認為是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的辦法，不願接受。因此國內發生了許多摩擦，幾乎要釀成大風潮。昨年近衛內閣末期，經過了許多磋商，才擬定折衷辦法，決定實施這兩項的規定。限制分紅的辦法，是資本在二十萬日元以上的公司。（一）凡現在分紅已在一分以上的，仍舊分配，如欲增加時，必須得財政大臣的許可。（二）凡現在分紅在一分以下，六厘以上的，每年得增加二厘。（三）凡現在分紅未滿六厘的，得自由

增加至六厘。這比較是緩和得多了，若照右派的主張，則必須以一分爲最大限度，不得超過一分。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敵人的工業，演成跛行狀態，軍需工業非常發達，分紅非常之多。而平和工業是正比例的萎縮了。國內對於軍需工業者，非常側目，不但在戰費負擔上，發生了不均衡的狀態，而且乘着戰爭的機會，軍需工業者及關係者發了不義之財，非加限制，不足以昭公允，發動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主要作用在此。因爲國家總動員法各項規定陸續實施的結果，所謂「戰時經濟體制」更加周密，更加強化。此外如外匯管理法，電力國家管理法，職業紹介所國營法，肥料分配法等，皆爲此而制定的。現時他們政府對於任何部門的生產事業，皆有統制的權力，不但生產如是，消費也是如此。甚至或部門的分配，也由政府加以統制。從全局看來，敵人的經濟制度，已由自由競爭的經濟，進入國家統制經濟的階段了。

(七)日本戰費來源的窮困

日本是窮困的國家，戰爭開始以前，因爲擴張軍備，每年財政總是依賴公債來彌補的。這種公債，他們稱爲「赤字公債」。他們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常常警告軍閥，國家財

力負不起這麼大的軍備。公債如達到一百萬萬日元，就要亡國。在五一五事件以前的內閣，差不多都是因為這問題，引起內閣與軍部的摩擦。但是軍部的壓力過大，而且時勢的潮流，不易反抗的，經過了許多事變之後，穩健的政治家也不能不退讓了。軍部發動了九一八事件，造成任何政治家都不能不接受他們主張的局面。所以他們從九一八事變的翌年，昭和七年（一九三二）起，每年的總預算突然增加了。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歲出總數十九萬萬五千零十四萬日元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歲出總數二十二萬萬五千四百六十六萬日元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歲出總數二十一萬萬六千三百零二千日元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歲出總數二十二萬萬零六百四十七萬七千日元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歲出總數二十三萬萬一千七百十二萬四千日元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歲出總數二十八萬萬七千二百十三萬五千日元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歲出總數二十八萬萬六千八百萬日元

這與昭和六年（一九三一）的歲出，比較起來，便覺可驚，昭和六年僅十四萬萬七千

六百八十七萬五千日元。明年度的普通預算（日本會計年度每年自四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卅一日止爲一年度），又達三十六萬萬日元以上。這種加速度的增加，是敵人的國力所不能負擔的。敵人對我的戰費，皆在普通預算以外。七七事變發生，他們立從第二預備金中（日本預算皆列有預備金一項，以備預算外臨時支出之用）提出一千零十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日元，作爲臨時的出兵費用。是年七月二十二日適第七十一屆議會開會，又提出所謂「華北事變費」，一般會計九千六百八十萬九千日元，特別會計二十一萬五千日元，皆以公債爲財源的。七月底他們決定擴大軍事行動，在上海方面挑戰，於八月初，又在同一議會中，提出第二次所謂「華北事變費」追加預算，一般會計四萬萬一千九百六十三萬五千日元，特別會計三百一十一萬七千日元。其中三萬萬一千萬日元，是依賴公債的，一萬萬日元新辦「華北事件特別稅」來補充的。八月十三日上海事變發生後，我國堅強抵抗，他們又痛感戰事非短期可了，於是於八月十七日開議，決定召集臨時議會，卽第七十二屆議會。九月四日開會，一舉而提出「中國事變費」（他們將「華北事變」改稱「中國事變」），二十萬萬二千二百七十萬日元的巨大戰費，全部以公債爲財源。並且這預算是由昭和十二

年九月至十三年一月底爲止的。三項所通過的戰費，共計二十五萬萬五千二百六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三日元，而使用的期間，是從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七月至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一月爲止，其中二十三萬萬三千二百七十萬日元，是發行公債的。

我們從戰爭初期中，敵人三次增加戰費預算的步驟看來，便可以斷定敵人逐步實現預定計劃的陰謀。他們在八月七日通過了四萬萬三千二百餘萬的戰費，而八月十七日又決定召集臨時議會，提出二十萬萬餘的戰費，相差不過十日。他們所以分作三次提出的原因，不外希圖掩飾而已。但是從步驟，期間，數額看來，正所謂「欲蓋彌彰」了。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於九月八日閉會後，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七十三屆普通議會又開會了。他們在這次議會中，又提出第四次「中國事變費」四十八萬萬五千萬日元的驚人的戰費，除了三萬萬日元（內一萬萬日元是繼續以前的），是創辦「中國事變特別稅」來補充的，一萬萬日元，是由官營事業利益中撥用的，其餘四十四萬萬五千萬日元，全部依賴公債的。前後四次的戰費，自開戰到今年三月卅一日止，共用戰費七十四萬萬零二百六十六萬二千二百二十三日元，其中六十七萬萬八千二百七十萬日元，是發行公債彌補的。今年四月一日至明

至三月卅一日止，對我戰費，業經議會通過，預算額是四十六萬萬五千萬日元，其中四十二萬萬日元，又是發行公債的。從過去敵人對外作戰的歷史看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役，共用戰費二萬萬五千萬日元，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役，共用戰費十八萬萬五千萬日元，一九一四年的日德戰役，共用戰費三萬萬五千萬日元。若以這三次戰爭與這次戰爭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據說一八九四年中日戰役，每兵每日所需僅八角，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役，每兵每日所需約二元四角，一九一四年日德戰役，每兵每日所需約三元二角。現在據專家估計，因物價騰貴與軍器發達的結果，每兵每日所需約十七元五角左右，所有糧食，子彈，軍火，消耗，運輸，宣傳等等費用，包括在內。比日德戰役增加五倍半，比日俄戰役增加八倍弱，比中日戰役增加十一倍。敵人現時每日所用戰費，約一千二百萬日元左右，而每日所發行的公債，也與此相等。就這趨勢看來，其不能支持，明甚。

(八)日本國民負擔力的薄弱

我們要檢討敵人的負擔力，究竟如何？敵人每年國民總所得不過一百二十萬萬日元至一百三十萬萬日元左右，其中除了消費以外，實際可以儲蓄成爲資本的，只有二十萬萬日

元至三十萬萬日元左右。這就是每年所能負擔的力量。開戰以來，敵國政府極力提倡節約，務須盡量減少消費，盡量增加儲蓄，所以過去十幾個月中，頗有效果，各銀行的存款與郵政儲金都增加了，可是存款增加的速度，沒有戰費增加速度快，還有許多應發未發的公債約二十餘萬萬日元，存在財政部的庫中。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開戰以後，他們財政當局所苦心計劃的，就是推銷公債問題。他們的戰費，十分之九以上，是靠公債的，公債如不能推銷，戰費就無從籌措。最近四年敵人公債總數，大體如左：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九十五萬萬八千零八十九萬一千日元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一百零三萬萬九千五百二十萬零六千日元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一百十八萬萬九千二百九十四萬九千日元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一百六十二萬萬三千三百四十四萬九千日元

昨年一年公債增加的速度，真是空前未有的。昨年所發行的公債，達四十三萬萬四千零五十萬日元之巨，而昨年預算上應當發行的公債，約五十一萬萬六千七百二十萬日元，因為市面不能承銷，只發行了百分之八十四，並且四十三萬萬四千零五十萬日元公債之中

，真由國民直接購買的，不過四萬萬六千二百萬日元，約佔百分之十，其餘百分之七十五，是用種種方法，由金融機關，各種工商業公司，郵政儲金局承銷的，尙有百分之十五，只得由日本銀行充作發行紙幣的保證準備，換句話說，就是惡性通貨膨漲的因素。我們從這個數字看來，就可以推測敵國國民每年自動購買公債，不過五萬萬日元左右，而每年應發行的公債，總在五十萬萬日元上下，其中有三十萬萬日元，非用特殊方法，強迫各銀行，各信託公司，各保險業，各大公司承銷不可的，其餘則爲日本銀行增發紙幣的保證準備，所以戰事期間越長，公債發行越多，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也越多，通貨膨漲的性質，也越變越惡化。這是敵人經濟的致命傷。現在公債發行的趨勢；至本年年底，必然要達二百萬萬日元的數字，每年週息平均以四厘計算，僅付利息，就要八萬萬日元，財政還不至破產麼？從前他們財政權威高橋是清說過：「百億公債，即可亡國」，現時即將超過一倍，其何以堪！

（九）通貨膨漲的惡性化

我們要研究敵人通貨膨漲的趨勢，必須先研究戰前的通貨狀態。因爲戰費公債，幾乎

全部由日本銀行承受，再由該行轉售與各銀行各公司，如賣不出去，則由日本銀行充作保證準備，發行紙幣，所以公債與通貨膨脹，有連帶的關係。試舉最近六年日本銀行紙幣最高發行額如左：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十五萬萬四千四百八十萬日元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十六萬萬二千七百三十萬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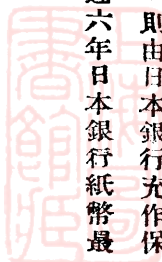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十七萬萬六千六百六十萬日元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十八萬萬六千五百七十萬日元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二十三萬萬零五百十萬日元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二十七萬五千五百萬日元

我們從這簡單的統計看來，就知道戰費公債通貨膨脹的關係，如何密切了。在一九三六年，日本銀行紙幣最高發行額，不過十八萬萬六千六百六十萬日元，到了一九三七年，便增加到二十三萬零五百十萬日元，一年之中增加了四萬萬三千八百五十萬日元。一九三八年又比一九三七年增加四萬萬四千九百九十萬日元。兩年之間，增加了八萬萬八千八百



四十萬日元，豈不驚人！通貨如此澎漲，物價怎能不漲！日本銀行紙幣的保證準備發行額，本來只有十七萬萬日元，後來增加到二十二萬萬日元，現在又增加到二十七萬萬日元。現金準備發行額，只有五萬萬日元。日本銀行的紙幣，撥與朝鮮台灣兩銀行作發行紙幣的基金，共計約有三萬萬五千九百六十萬日元。日本銀行紙幣本來是不兌現的，而朝鮮台灣兩銀行的紙幣，更是不兌現的。近來敵人又把日本銀行的紙幣，在票上畫了兩條紅線，蓋了「軍用票」三字戳印，運到上海使用，真是陰險極了。同時在北平偽組織之下，設立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鈔。而偽鈔的基金，是用朝鮮銀行紙幣充數的，等於把日本銀行不兌現紙幣，推行到平津濟青各地去。我們預料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額，到今年底，必定要達二十三萬萬日元左右，物價也必定隨着加速度的騰貴，國民生活要受更嚴重的威脅。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東京零售物價比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騰貴百分之十二・二，而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又比昭和十二年騰貴了百分之十六・二，是兩年之中騰貴了百分之二十八・四。今年的趨勢，可想而知。這就是敵人金融的危機。

（十）農村問題與農民的窮困

日本本來是農業的國家，明治維新以後，經過五十年的努力，才轉變為輕工業的國家，但是農業仍佔重要的地位。我們就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的三年間的統計看來，便可以明白的。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全國生產總價額一百三十一萬萬五千一百萬日元

工業生產價額九十三萬萬九千萬日元

農業生產價額二十三萬萬九千三百萬日元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全國生產總價額一百五十一萬五千一百萬日元

工業生產價額一百萬萬零八萬三千七百萬日元

農業生產總價額二十八萬萬二千八百萬日元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全國生產總價額一百七十二萬萬三千五百萬日元

工業生產總價額一百二十二萬萬五千一百萬日元

農業生產價額三十二萬萬五千七百萬日元

由這些數字，可以看出農業生產價額，大體上佔生產總價額六分之一。敵人全人口七

千萬之中，農民一千五百萬左右，佔五分之一弱，地位重要，不言而喻。但是農民的負擔特別重，據他們專家估計，農民每年須收入十分之一乃至一點五，是負擔各種租稅的。農產物的價格，有日趨低落的傾向，肥料的價格，又有逐年騰貴的趨勢，所以農民的收入，無論從絕對價值說，或從相對價值說，皆已降低。據他們調查，全國農民負債總數，達五十萬萬日元之多。平均每一農民負債約三百三十三元。敵人全國之中，尤其以東北六縣，農村狀況爲最壞。外國人要到東北旅行，他們一定拒絕的。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國務總理大臣濱口雄幸被刺事件發生以後，破獲血盟團祕密組織，發覺他們的動機，皆由農村貧困而來，於是農村救濟問題，始爲爲政者所重視。但是各種救濟方策，皆不澈底。並且來自田間的士兵與軍官，對於現在社會機構，益形不滿。反對資本家，打倒資本主義的呼聲，遍於全國農村。所以數年之間，由這類祕密團體所發動的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右派團體以及青年軍官所迫切期待解決的，只有農村問題。五一五事件以後，漸進的右派軍人所要求內閣解決的，也是農村問題。但是自齋藤內閣至近衛內閣，始終對這嚴重的問題，並無切實有效的救濟方案。戰事發生以後，農村問題更形惡化，因爲徵召的兵士，多係農

村子弟，農村勞力，大感缺乏，生產力當然減少，並且徵發馬匹與糧食，數量甚大，所以農村與軍需工業，正成相反的對照。戰爭越久，農村越衰落。假使無合理的救濟方法，難保不引起農民的暴動。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大問題。

（十一）日本社會的奇怪現象

敵人在科學方面，經五十年的努力，不能不謂有相當的進步，尤其在醫學方面，頗有可觀。但敵人民族性，有特別奇異之點，即迷信神道，非常普遍，而且根深蒂固。敵人本來受印度的影響，信奉佛教，幾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於佛教之外，又信奉各種邪教，故這類神祕的團體及莫明其妙的宗教，遍地皆有。如神道教，大本教，人道教等，皆為驚動一時的邪教事件。這類邪教，多則有信徒二三百萬人，少亦數十萬人。教主從信徒榨取獻金，養尊處優，幾等帝皇。建築廟宇，動費數百萬元。每因教主利用信徒的迷信心理，實行奸淫行爲，致被破獲。最可怪者，信徒並非愚夫愚婦，有許多是達官顯宦，和智識分子，真是不可思議。敵人每一家庭皆供奉神佛，每日膜拜，必恭必敬。甚至汽車司機人，也必請神符，懸掛車上，求免災難。從軍的軍人每人身上，也帶神符，祈願安全。這次

我們在各戰場所俘獲的敵人官兵及屍體，都發見這種神祕的東西。我們所擊落的敵人飛機，及所俘獲的空軍官兵，也有同樣的發見。神佛在敵國的威力，如何偉大，可想而知。所以他們如此迷信，即他們學者也沒有正確的解答。

敵國自殺風氣，非常厲害，尤以情死風氣，最爲普遍。我們僅就他們報紙所報道的事件而觀，至少可以說每天有三四件。報紙所未報道的，尙不知若干。自殺的風氣，是不足爲訓的。人生目的要前進的，要奮鬥的，遭遇任何困苦艱難，都要想法克服的，自殺便是退却，便是卑怯，情死更不足道。敵國習慣，結婚離婚是比較自由的，何以情死如此之多，真不可解。至於情死方法，跳山的，跳水的，臥鐵軌的，服毒藥的，都有。敵人所引爲榮譽的「切腹」死法，近來却不多見了。因爲現代的日本人，已不如以前的勇敢了。當武士最受社會崇拜的時代，「切腹」的死法，最爲社會所樂道。以武士自命的人們，也以這種死法，爲最榮譽。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敵人心理與信念的變遷。

敵人素以廉潔政治自稱，其實達官顯官貪污的事實，並不少見。明治年間的西門子事件，海軍重要將領受賄，引起了大政潮。大正年間，陸軍重要將領受賄事件，也有許多要

人下獄。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帝國人造絲公司事件，兩位前任大臣，財政部次官司長，及台灣銀行經理等十六人犯受賄嫌疑下獄，致齋藤內閣因此瓦解，這是最近的貪污大事件。此外如一個縣政府會計課長，可以侵吞公款至數十萬元之多，真是驚人的怪事。貪污的原因，當然甚多，敵人在歐戰時，不但沒有受戰爭的損害，而且發了許多戰爭的暴財，社會風俗，自此以後，日趨奢侈，一飯千金，並非意外事。至今我們在敵人國內，隨處可以看見華麗的飯館和咖啡館，只就東京一處而言，每日消費在這些娛樂場所的金錢，總在三十萬元左右。更奇怪的，最近十年，打麻雀的風氣，非常之盛，到處却有麻雀俱樂部。表而雖然不賭錢，事實上暗中仍有金錢的輸贏。這是敵人國民性墮落的一個表現。

敵人前後四次戰爭，都是在國外作戰，所以他們除了當兵以外，沒有認識戰爭的悲慘。兩年的日俄戰爭，死亡雖然慘重，但是他們生活上還沒有感覺重大的壓迫。這次對我作戰，規模之大，遠非日俄戰爭所可比，而物資的統制，更非彼時夢想所可及。現在不獨奢侈品是不易得的，即生活上必需品，也有嚴密的限制。如毛織物，除了軍隊以外，是不許用的。棉織物，因棉花進口限定數量，也不能購買了。皮革之類，是專供軍隊使用的，連

皮鞋都買不着了。要縫新洋服，必須交出舊洋服作交換的。五金類也除了軍用以外，都用替代品了。今年物資的統制，必然更加嚴密。物資的缺乏，也必然更加深刻。我們在這次戰爭，必須給與敵人以前絕後的嚴重教訓，才能喚醒他們征服中國，征服亞洲，征服全世界的迷夢！

——完——

徵
情
研
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480B



三八



256120

(4)